

古城旧事

安淑媛

# 大象滑梯旁的欢乐时光



前些日子,从报纸上看到迎泽公园大象滑梯加固整修后重新开放的消息,我的思绪飞回到了47年前,那温馨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——

1974年,我的大儿子上四年级,女儿上二年级,只有3岁的小儿子在幼儿园。我在学校教书,每天又上班又带孩子,晚上还要在缝纫机上做衣服,忙得团团转。大儿子放学后就到幼儿园接弟弟回家,8岁的女儿回家就扫地、倒垃圾,好让我一下班就能给全家人做饭。看着两个懂事的孩子,我心中很是愧疚:什么时候能领着他们去公园玩呢?六一儿童节到了,学校上午开庆祝会,下午放假,我决定利用这宝贵的半天假带他俩去迎泽公园玩。

吃过午饭,两个孩子穿上我给他们熬夜缝制的新队服——白衬衣、蓝裤子,系上红领巾,我们三人乘坐公交车到了迎泽公园,一进大门,两个孩子就欢呼着朝大象滑梯奔去。

那天下午,风和日丽,天气晴好。我在滑梯旁边的长椅

上坐下来,看着两个孩子高兴地从大象尾部爬上去,又坐着从大象鼻子滑下来,刚刚滑下来又“咚、咚、咚”地朝后边跑过去,再爬上去,再滑下来,兄妹俩不知疲倦地笑着、跑着,一次又一次爬上去、滑下来,像两只快乐的小鸟。我坐在长椅上,靠着椅背享受这难得的闲适,心里感到一阵轻松,一种释然:我总算有时间陪着孩子来公园玩了!他俩欢快的笑声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、最大的褒奖。想着想着,我眼睛潮湿了,对不起啊孩子们!平时你们除了完成作业还要帮我干家务活,让你们跟着妈妈受累了。

从迎泽公园出来,我领着两个孩子进了一家照相馆,兄妹俩并排坐在凳子上,露出甜甜的笑容,留下了一张红领巾童年美照。

回到宿舍区,我们一起到幼儿园接上小儿子回家。我拉着小儿子胖乎乎的小手,心里想:儿子,等你上了学戴上红领巾,妈妈一定领你到迎泽公园玩一次!

## 往事钩沉

## 粜 粮

梁建军

不知不觉,插队回城已经45年了。回城分配工作的那段日子,是令人欣喜而忙乱的,印象最深的是“粜粮”,就是卖口粮。这是当时户口“农转非”吃城市供应粮食的必须环节。

1976年,我插队已经两年多了,在农村大田里劳动了一年,春种秋收、兴修水利、园田化的活都干过了,在知青食堂还工作了一年多。那时知青返城条件是插队满两年,这是个硬杠杠。在我之前插队的男知青已经都返城了,女知青指标少,有的插队3年多了,还在广阔田地里劳动。看着和自己同来村里插队的或比自己晚的也陆续拿到了招工指标,我有些魂不守舍,企盼着招工指标早日能落在自己头上。

那时,招工大多是在下半年。11月,小店公社又来了招工指标,太原化肥厂定向从小店公社招10名男知青,我们红寺村分配了两个名额,村里研究后决定让“老资格”的我和郭晋生去化肥厂工作。虽说回城当工人是梦寐以求,但分配到化肥厂工作还是喜忧参半。喜的是回城梦就要实现了,忧的是化工企业空气污染大、离城远。再说,那时的年轻人大多想学技术,愿意干个车钳铆焊电工,化肥厂多是操作工熟练工,不论怎么说,回城到国营大企业工作还是非常兴奋,我连夜骑车十几公里回去给父母报喜讯。

过了几天,村里给我们发了盖有太原市劳动局统一制作的“四联单”,这就是“招工指标”。“四联单”薄薄的纸,色彩不一样,主要内容都一样,每联要给不同的单位,也是迁移户口的凭据。我们从村里开上介绍信,再到小店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,而后再把户口落入父母居住地派出所,这就成了太原市城镇居民了。

接下来就是迁移粮食关系,这也是吃城市供应粮的依据。我们回了村,领上我们当年没有吃掉的口粮,即玉米、高粱,而后到粮站卖给国家,叫粜粮。粮站只按国家规定的口粮数量收购,不论品种。我和同回城的晋生,借了辆小平车往粮站拉粮食。

村里离小店粮站有3公里,我们一个拉车,一个推车,一路上都是乡村公路,没有爬坡过坎的,也不累,不到一会儿就到了粮站。递上手续,每公斤玉米收购价0.18元,高粱0.17元。我们把粮食过了磅,分别倒入存放玉米和高粱的库房,领上卖粮款,带上盖有南郊区粮食局红印的“太原市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”,就可以回到市里粮食票证管理所,办理粮食关系了。第二个月,就吃上了城市供应粮。

1992年底,我省粮票停止了流通,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时,还要办理粮食关系,但不再卖口粮了。粜粮也成了尘封的往事。

## 岁月留痕

## 一台大型收音机

老同学给我发来一张老照片,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平遥中学读高中时的班主任、物理老师刘德森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,这让我想起了当时在学校的情形。

当年刘老师刚刚工作不久,瘦瘦的身材,高大帅气,挺直的腰板,走路迈着大步,讲课生动活泼,因为个头高,板书时常常成弓步或马步,他的课很活跃。

给我印象更深的是,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,刘老师利用实验室的教学实验器件做了一台体量很大的板式收音机,挂在校园的墙上,让大家收听世乒赛的实况。

那个年代,我们国家提倡勤俭办事情。当时的收音机是用电子管装的,老师因地制宜,因陋就简,将实验室可利用的东西按照设计要求装在一块薄木板的平面上,当然就占了很大的地方。组装时有部分学生参与,也是一次很好的

杨斯葆

## 物理实习课。

世乒赛期间,每到课余时间,在这台体量巨大的板式收音机旁,总是聚集着许多师生在收听比赛实况。正是从那时,人们知道了容国团、邱钟惠、庄则栋、李富荣、徐寅生等为国争光的乒乓健儿。中国队和日本队争夺团体冠军的比赛中,中国队前3局1比2落后,徐寅生赢了第4局,实况广播听得人们热血沸腾,心潮澎湃,好像心都要跳出来了。

这次世乒赛,中国队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,庄则栋获得男子单打冠军,邱钟惠获得女子单打冠军,大大地增强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,鼓舞了人民的士气,从此乒乓球成为我们的国球。

那个简陋的大型收音机后来没有保留,因为那些器件还要拆下来做实验用呢,但是刘老师为大家做的这件事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## 乡土记忆

## 饲养室的热炕头

黄宇辉

每到冬日,我就想起小时故乡饲养室的大热炕来。那时耕田种地的驴马牛骡归生产队所有,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供牲畜吃喝拉撒睡的饲养室。因为生产队不缺麦草、玉米秸、棉花秆、牛粪,脚勤手快的饲养员把饲养室的火炕烧得杠杠热,所以饲养室比村民们的屋子要暖和许多。

男人们白天收工后,晚上撂下饭碗,就赖在生产队饲养室的热土炕上蹭热,直到实在困得不行了,才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家。饲养室的火炕大约有四米长、三米宽,用土坯垒成,炕上铺一张炕席,由于火炕长期灼热,炕席中央经常被烤得焦糊一片,黑乎乎的,炕坯都裸露在外面。每年一入冬,地里没有了农活,农闲的人们就簇拥在饲养室,像插萝卜似的挤在热乎乎的大炕上。人们在牲口反刍着草料的节奏声中,一边吸着自制的旱烟卷,一边闻着炕内燃烧着的秸秆和牛粪味儿,天南地北、海阔天空地聊着天,和粪圈里骡马的嘶吼声交织在一起。到了饭点,女人们叫着各自的男人吃饭时,这才极不情愿地下了热炕。

饲养室的热炕也是我们小孩玩耍的乐园,每到寒假,

我们小孩子跟着大人们挤在饲养室的炕上凑热闹,调皮的孩子在炕上翻着跟头,有时不免手脚碰着大人们噙在嘴里的烟锅袋,弄得星火四溅,这时大人们就驱赶我们下炕。为了在热炕上拥有一席之地,每当此时,我们便会老老实实地坐在大人中间,可能是我们小孩子皮肤稚嫩,受不了长时间火炕的灼热,就找一砖块垫在屁股底下,有时就蜷缩在炕的边缘,听着大人们的谝闲话。

记得那时社员们还经常利用冬闲时在饲养室组织开会或学习。此时的土炕已堂而皇之地成了开会学习的主席台,生产队长表情严肃,坐在炕的中间,其他队干部围坐在队长旁边,队长拿着一张报纸,念给社员们听。队长戴着老花镜,借着油渍渍的马灯光亮,用方言土语念起来。社员们有的靠在牛槽上,有的依在马桩上,有的蹲在地上,姿势各异,有的甚至就地隆起篝火,一边围火取暖,一边听着队长滔滔不绝地读报声,等队长读完了报纸宣布散会时,大家的兴致还意犹未尽。

往事如烟,饲养室的热炕头及一幕幕热闹的场景,至今还存留在我的记忆里,让我回味无穷。

王安芬

## 情系故人

## 怀念师傅



近日,惊闻我的师傅田佩玺去世,感慨万分。老人家走过了一个世纪,享年102岁,他是我的同事,组长、领导、更是生活中我们的兄长,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

田佩玺是上世纪50年代太原印刷厂彩印车间制版组的第一任组长,他管理着接稿、照像、修版、晒版、打样等工作30多人。我们一起工作40多年,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精益求精的态度,时刻影响着我们,引领着我们前行。

还记得1964年,我生下第一个孩子时,正赶上爱人在农村搞“四清”运动,家里老人也不在身边,田师傅就让他爱人常来帮助我,指导我怎么给小婴儿换尿布,如何掌握喂奶的时间,还送来新鲜的小米和蔬菜。在满月的那天,田师傅给我送来了他亲手制作的鸡蛋壳小动物挂件。

他的细心和默默付出,让我们组的女工都受益无穷,赞不绝口。他教我们组女同志们学会了腌咸菜、包粽子、炸丸子等过日子的技巧。还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们的工房没有暖气,生着火炉,每天早上我们来上班,勤劳的田师傅早已把火炉生得旺旺的,暖壶里灌满了开水,地上干干净净洒了水,让我们这些每天去托儿所、幼儿园送孩子的年轻妈妈们倍感温馨、温暖,内心充满了对田师傅的敬意和感激。

在和田师傅一起工作的日子里,我们接过无数的书刊、画报、商标、年画、有价证券、布告的印制工作,其中很多都是政治性、绝密性强的制版任务。他率领我们,积极

认真,齐心协力圆满完成工作,赢得了领导的好评和客户的高度赞誉,更为我们太原印刷厂赢得了良好的口碑。

还记得田师傅的儿子在一个小山村车站工作,当时有人让他找找领导,走走后门,把儿子调回来,以他的资历和人脉,这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,但我们田组长却不为所动。管理车间,他总是勤俭节约,修旧利用,默默地付出。他不会说什么漂亮话,有的就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精彩。

1980年,田师傅退休了,我和陈丁山接替了制版车间的工作。一段时间后,我们又请回田师傅管理原材料,直至1990年,我也退休。多年以来,每逢节假日,我们都会相约老同事去探望我们尊敬的师傅。今年夏天,我们再次看望田师傅,当老人家颤巍巍叫出我们每个人名字的那一刻,我们这群80多岁的徒弟都如孩子般欣喜。

尊敬的师傅,我们想念您!